

徐森玉致那志良信函二通考释

徐婉玲

内容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森玉致那志良信函二通,分别作于1938年9月6日和12日,集中谈论故宫存筑文物拟移至昆明保存、徐森玉奉命赴昆明寻觅皮藏文物处所之事,涉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关键词:故宫文物南迁 徐森玉 那志良 信函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森玉^①致那志良信函,为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家属所捐赠的有关故宫文物南迁史料之一。二信写作时间前后衔接,分别是1938年9月6日和12日,前函为贵阳出发前所寄,后函为抵达昆明时所寄,集中谈论马衡拟将存筑文物先期移至昆明保存、徐森玉奉命赴昆明寻觅皮藏文物处所之事。目前公布的文献档案及研究文章多为故宫文物西迁之梗概的叙述,诸多历史细节则鲜为人知。从这一角度而言,此二通信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兹予整理,并略作考释。

第一函曰(见图1):

心如^②尊兄左右:

在渝曾寄一函,谅邀青照。弟于前月廿五日启程,廿七日安达贵阳。离此四月,人口增至十倍,市容多处改观。小寓竟为强有力者擅据,无法与之理论。不得已暂向寺中假一榻之地而居,殊感不便也。存筑文物检查业已

①徐森玉(1881-1971),名鸿宝,字森玉,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问学于白鹿书院,后乡试中举。不久,弃学而入山西大学堂。后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奉天测绘学校及实验学校监督,清学部图书馆编译员等。民国初年任教育部秘书、佥事等职,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1924年11月,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又改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抗战时期,参加故宫文物南迁工作,奔走于上海、长沙、北平、汉中、贵阳、成都、重庆、昆明、香港等地,为保护和收集文物呕心沥血。1948年冬,参与主持故宫文物迁台工作,1949年离开故宫博物院。建国后,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

②即那志良(1908-1998),字心如,河北宛平人。时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二科科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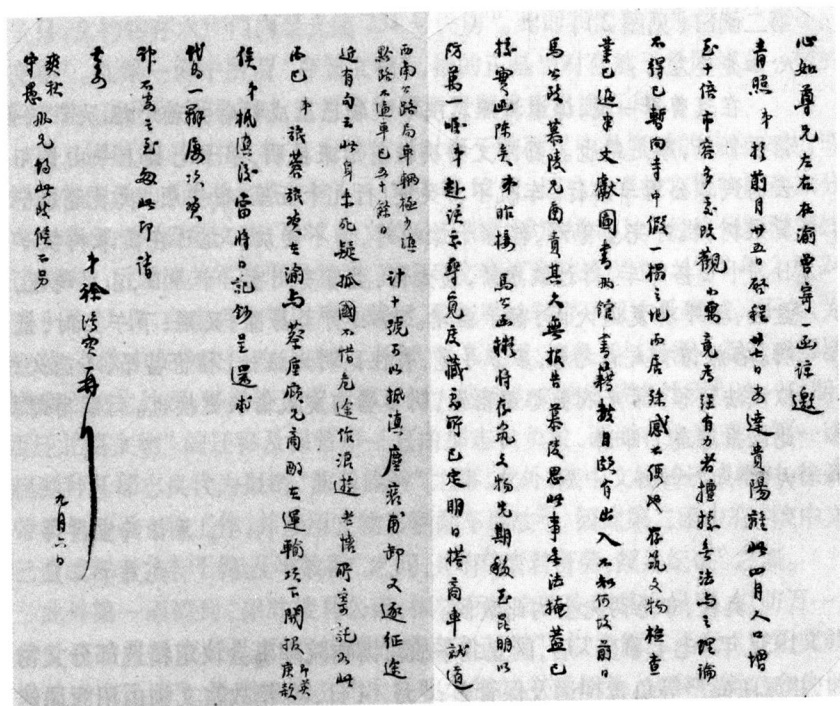


图 1

过半，文献、图书两馆书籍数目颇有出入，不知何故。前日，马公^①致慕陵^②兄函，责其久无报告。慕陵思此事无法掩盖，已据实函陈矣。弟昨接马公函，拟将存筑文物先期移至昆明，以防万一，嘱弟赴该处寻觅度藏处所，已定明日搭商车就道。西南公路局车辆极少，滇黔路不通车已五十餘日。计十号可以抵滇。尘装甫卸，又逐征途，近有句云：“此身未死疑孤国，不惜危途作浪游。”老怀所寄托，如此而已。弟旅蓉旅费，在渝与蔡屋廩^③兄商酌，在运输项下开报即英庚款。俟弟抵滇后，当将日记钞呈，还求代为一办。屢次费神，不安之至。勿此，即请
大安

弟徐鸿宝再拜
九月六日

爽秋^④、守愚^⑤两兄均此致候，不另。

①即马衡(1881-1955)，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时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

②即庄尚严(1899-1980)，字慕陵，河北大兴人。时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

③即蔡元塋，字屋廩，浙江绍兴人。时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总务处第三科科员。

④即吴玉璋，字爽秋，河北大兴人。时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二科科员。

⑤即牛德明，字守愚，河北大兴人。时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二科科员。

第二函曰(见图2):

心如先生左右:

在筑曾寄一笺,谅邀青照。陕中文物已至成都者共若干箱,及半数否?诸君贤劳,颇足纪也。贵阳文物决提前运来昆明,弟于七日上午由贵阳乘云南汽车公司车启行。车机不甚灵便,行九十五里,宿安顺。次晨经镇宁至黄果树,机身完全停滞,修理十多小时,仍不转动。九日在黄果树候车竟日。十日搭邮车,行过铁索桥,遇大雨,至普安州宿。十一日,山路崎岖,过盘县,至平彝复遇大雨,宿于曲靖。今日行至易隆,又雨,下午五时,抵昆明。各旅馆有人满之患,多方寻觅,暂住昆明大旅社。租价甚昂,不能久住,拟设法迁移。带来衣被悉遭雨湿,明日当向友人借衣更换也。行装甫卸,寄此以报踪迹。即请

大安

弟徐鸿宝再拜

九月十二日

爽秋、守愚两先生均此致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定精选部分文物迁湘,并派庄尚严等负责押运及保管事;8月14日,80箱故宫文物由招商局建国轮装载运离南京,并于21日辗转入存湖南大学图书馆。后因日寇侵华西迫,存湘文物议定迁黔。1938年2月10日,存长沙文物运抵贵阳,暂存城北官邸;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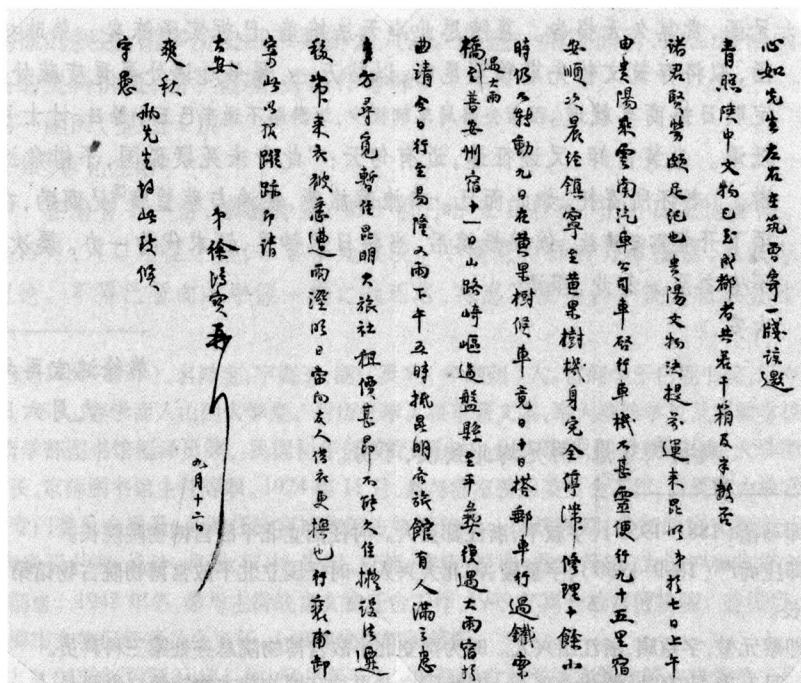


图2

月2日,文物转存六广门内灵光路231号民房^①。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迁南路文物”。而第一函中所谓“存筑文物”,指的正是当时存放于贵阳城北一带的故宫文物,至此函书写之时,这批文物藏于贵阳民房已逾五月。

第二函所谓“陕中文物”,指的是当时存于陕西汉中及褒城的故宫文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迁北路文物”。1937年12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再次奉命向西疏散文物,7287箱文物分三批沿津浦线北上,经徐州转陇海线西迁宝鸡。后因潼关军事形势紧张,存宝鸡文物议定转迁汉中。1938年2月24日至4月11日,存宝鸡文物以汽车载运,翻越秦岭转存于汉中及褒城。不久,为避空袭,存陕中文物决议改迁成都。1938年5月间,徐森玉与马衡一起赴成都勘选庋藏文物之处所,经勘查选定成都东门大慈寺为文物庋藏之处所^②。这一时期,“西迁北路文物”的迁移及保管事一直由那志良负责,因而有徐森玉在第一函中提到拜托那志良代为报销“旅蓉旅费”之事。此外,陕中文物转迁成都时,徐森玉曾参与押运文物工作,并亲历文物车辆翻车事故^③。因此第二函中有“陕中文物已至成都者共若干箱,及半数否”之问,并有“诸君贤劳,颇足纪也”之慨。

此外第一函提到“弟昨接马公函,拟将存筑文物先期移至昆明,以防万一,嘱弟赴该处寻觅庋藏处所,已定明日搭商车就道”,以及第二函云“贵阳文物决提前运来昆明”,说明徐森玉此次昆明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奉马衡之命为暂存贵阳的故宫文物寻觅一妥善庋藏处所;遗憾的是,函中并未谈及故宫文物迁滇计划以及此行昆明的大致目的地。而且,此事相关档案未见记载,其他信函亦未谈及。且众所周知的是,存贵文物最终并未迁移昆明保存,而是于1939年初迁存安顺华严洞秘藏^④。所幸的是,欧阳道达对此事有简单记载,曰:

迁黔未久,复议迁滇。惟敌机肆虐,是时几及西南,而黔省山多雾重,或可缩减空袭机会,文物避地,反较滇为宜。迁滇之议,因是再经考虑而作罢。然贵阳城内究非久存之地,遂于黔属镇宁、安顺县间相继查勘天然山洞,而为文物安全储藏所。^⑤

可见,文物迁移贵阳不久,确有迁移昆明之议。后因黔滇军事形势变化,文物迁滇之议作罢。故徐森玉为故宫文物赴昆明觅寻一妥善处所之事,亦随人事之变迁而鲜为外界所知。由此看来,本文所揭两函虽短,却为我们复原故宫文物迁转工作的具体细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作者简介】徐婉玲,女,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故宫博物院史及博物馆管理研究。

①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②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黄山书社,2008年,第117页。

③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④傅振伦:《故宫文物一部分移存贵州的经过》,《贵州文史》1982年第1期,第25页。

⑤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第54页。